

小说鉴赏 权威评定

新世纪

汤吉夫
刘海清
编选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中国小说排行榜

精 选

短篇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中国小说排行榜精选

(短篇卷)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汤吉夫 刘海清 编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中国小说排行榜精选.短篇卷/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
ISBN 978-7-201-05502-2

I. 新… II. 中…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914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8,000

定 价:28.80 元

学者视野中的年度小说

——关于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

陈星

新世纪伊始，好事当开头。中国小说学会拟对社会公布年度好小说的名单，并一年一度地推动下去，名之曰“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此举立时招来种种不同意见，褒贬皆有之。有朋友对我说，“排行榜”乃是图书市场的促销手段和媒体的把戏。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不去埋头做学问，也要来时尚一下，流行一下，风光一下吗？

我闻之笑之。然后说，“排行榜”的确是一种市场手段但它对读者却有强大的导向作用。年轻读者总会对畅销书发生好奇。其实，好书不一定畅销。一本书的畅销缘故很多，或因题材新鲜，或因内容奇特，或因书名诱惑，再加上商家的促销手段，高明并富有创意。而市场排行榜的本身就是促销的一招。这一来，好书常常因为没有挤上排行榜反成了市场上的“另类”。真正的文学另类却因畅销而貌似“主流”。

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因此受到了伤害？

可是转念一想，难道只有商家可以使用排行榜么？

其实，排行榜就是对作品的一种排名。历来各种各样的文学评奖所公布的结果，也都是一种排名；甚至还要排出一等二等

三等来呢。当然,不同部门排名标准各不相同。有的偏重文学性和艺术性,有的以主旋律为准绳,有的提倡文本的创新。可是,市场的排行榜没有这种“评”的程序,不需要任何标准,它只是一种销售数字的统计与排列。看似客观与公允。但别看这个排行榜在产生之前没有标准,在产生之后却公布出一个极为强有力的标准,即市场的效应。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销售的强度就是一种实力。这种价值观使得人们容易认同图书市场的排行榜。于是传统的各种文学评奖在读者界的影响就变得十分有限了。书的命运在市场中沉浮,受商家左右。这也是文学逐渐与评论及研究脱节的原故。

难道我们就不能借用一下商家的排行榜,树立我们自己的排行榜,让排行榜这种富于魅力的形式张扬我们的声音吗?

这个“自己的排行榜”的特征是: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评选委员会。评委都是学会成员中长期从事当代小说研究的教授、学者和评论家。这之中,既有雷达、陈骏涛、金汉、盛英这样老一代著名的人物,也有吴义勤、洪治纲、谢有顺这样年轻一代的新锐。既有汤吉夫、陈冲、韩石山这样的作家型的学者,也有夏康达、李星这样资深的学者型的评论家。他们是当代中国小说发展动态最密切的关注者;平时阅读着大量的当代小说,对文坛的现在时与过去时了如指掌。当一篇好小说出现,他们即刻能判断这小说在当代文学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价值。有这样一个评委会,就保证了学术上的可靠性。

第二,我们的排行榜不是简单而草率的次序排列,而是一种“研究和评论”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与图书市场排行榜最大的不同之处。参评作品的推荐,来自于一些高等学府的中文系与文学机构的推荐。这些推荐者都是本会成员:他们按照长、中、短不同的体裁,分担初评工作。在经过广泛阅读和充分研究之后,

才向评委会提出候选作品的名单。可以说,这个经过初评的候选名单,就是一种文学研究的结果。

评选委员会最后一轮的评选在天津举行。这次为期三天的最终的评选工作,依然是一次年度小说的学术研讨活动。从一篇篇作品的评价到全年小说的整体审视;从近年来的小说走向,到某一篇作品的特殊意义,评委们的话题总是往来无尽。故此,这个排行榜应被看作是中国小说学会对年度小说整体研究的学术成果。

第三,我们的排行榜的评选,坚持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原则与立场。中国小说学会是民间学术团体:一切从小说文本出发。任何作家的成就与名望,作家之间地区、民族、性别上的比例搭配,作品销售的状况等等,都不在评委视野之内。这样才可能使结果更接近于文学的纯度,使得年度好作品与新人不至于淹没。

第四,这个排行榜的客观性反映在最终的无计名投票上。评选委员会遵循:投票前充分酝酿讨论,投票时一切听凭个人。只有在评选结果上的听其自然,才是民主原则的真正体现。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评选的全部工作,纯属一种纯文学的活动。工作没有经费,评委没有报酬。作家型的评委个人的作品一概不能参加评选。然而评选工作却做得认真精细,不拒繁重,为了一部作品的评价往往争执不休。无须多说,这表现着学会的一种心甘情愿背负着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当然,还有学者们在“权威性”上的自信。

于是,我对前边说到的那位朋友说:

你说文坛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种排行榜——它来自于学术研究,体现学者的视野,反映着文学对自身的关切与自审?

图书市场是先卖书后出榜,以榜促销图书;我们则是先评出排行榜,再将作品进一步推荐给读者。这正体现我们开展排行

榜工作的初衷！图书市场针对的是书，我们针对的是作品；市场的排行榜是销售结果，我们的排行榜是研究结果。而在这次结集出书时，我们还请参评的各位评委分别撰文，评点作品，论其价值，举荐于世。这样，我们的工作便有了完美和独立的结果。

我们希望文坛多一些视角，多一些学术的声音，多一些不同标准的排行，以使读者眼中不仅仅是光怪陆离的商业化的宽银幕。

我们的排行榜会一年一度地做下去。我们相信，它对文坛渐渐会发生有益的作用。日久天长之后，读者就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学者的视角，并通过这个深邃的视角发现到更多美丽的文学风景。

目 录

序..... [1]

2000 年

上海女人 杨显惠 [1]
清源寺 徐小斌 [30]
河柳图 迟子建 [43]
冬天我们跳舞 唐 颖 [62]

2001 年

湖道 漠 月 [78]
日子 陈忠实 [88]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魏 微 [98]
地下爱情 孙春平 [123]
把门关上 戴 来 [144]

2002 年

黑猪毛 白猪毛 阎连科 [158]
库麦荣 贾平凹 [177]
白雪猪头 苏 童 [188]
突厥 杨剑敏 [198]
给马兰姑姑押车 刘玉栋 [216]

2003 年

逃跑 铁 凝 [229]

猛虎	叶 弥 [242]
雪色花	王 松 [255]
手术	盛可以 [271]
送一个人上路	张学东 [290]

2004 年

两位富阳姑娘	麦 家 [304]
月光斩	莫 言 [320]
狗小的自行车	卢江良 [331]
我疼	陈希我 [351]
白水青菜	潘向黎 [370]

2005 年

取暖	乔 叶 [384]
锦衣玉食的生活	方格子 [400]
负一层	黄咏梅 [413]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范小青 [430]
流亡者社区的雨夜	阿 成 [442]

2000年

上海女人*

杨显惠

今

今天我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一九六〇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大约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玉良、文……哎呀，叫文什么来的，就是那个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他叫文大业，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 原载《上海文学》2000年第7期。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柴烧，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儿，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飞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行。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会把肚子里的其

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黏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了一趟厂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了，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经常是我们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

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粘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肛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绝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小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

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一九五六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十八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子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

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捱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被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 and 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拣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十一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两三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在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儿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玉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

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领导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建义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一九五九年的时候,夹边沟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布,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

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儿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嗷嗷,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农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我的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就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三四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